



# 新闻学传播学文摘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igest

DIGEST

2017. NO. 2 总第6卷 (Vol. 06)

唐绪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主办

W. NO. 2 Vol. 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新闻学传播学文摘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igest

2017. NO. 2 总第6卷 (Vol. 06)

唐绪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学传播学文摘. 2017. NO. 2 / 唐绪军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203 - 4301 - 5

I. ①新… II. ①唐…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520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彭莎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郝美娜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38 千字  
定价 8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全文转载

- 唐代的政治传播体系建设与国家整合 ..... 陈雅莉 张 昆 (3)
- 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 夏倩芳 王 艳 (17)
- 互联网革命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之反思
- 一种技术自主性的观点 ..... 唐海江 (39)
- 连接城乡：作为中介的城市传播 ..... 谢 静 (51)
- 冲突与调适：微信空间版权正当性的反思 ..... 朱鸿军 (65)
- 算法机制背后的新闻价值观
- 围绕“Facebook 偏见门”事件的研究 ..... 方师师 (84)
- 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  
动员机制研究 ..... 王洪喆 李思闽 吴 靖 (104)
- 微信春节红包在中国人家庭关系中的运作模式研究
- 基于媒介人类学的分析视角 ..... 张 放 (126)
-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英雄原型在当代影视剧中的转化 ..... 江逐浪 (140)
- 公共健康话语网络的两种形态与关键影响者的角色：  
社会网络分析的路径 ..... 官 贺 (153)

## 论文摘编

### 理论与范式

- “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 ..... (183)
- “情”为何物？
- 反思公共领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 ..... (187)

激进传统与产业逻辑：论传播政治经济批判的两种路径 .....	(190)
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 .....	(195)
从“批判话语分析”（CDA）到“传播民族志”（EOC） ——话语、传播实践与“钟情妄想症”的分析示例 .....	(198)
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	(203)
<b>新闻史论</b>	
“造健全之舆论”：清末民初士人对于“舆论”的表述与群体认知 ——兼论近代中国舆论的难局及其历史走向 .....	(207)
作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 .....	(213)
媒介变迁与乾隆朝的社会异动 .....	(217)
<b>媒介研究</b>	
“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 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 .....	(221)
“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 .....	(226)
政府认同差异化：对农政策传播的新困境 ——基于湖北省S市实地调研的研究 .....	(230)
音乐内容和形式呈现与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基于对美国非华人艺术接受者的实证分析 .....	(233)
<b>新媒体研究</b>	
第三种论坛：体制性网络空间的公共性透视 ——以苏州“寒山闻钟论坛”为个案 .....	(237)
网络空间中的数据及其治理机制分析 .....	(241)
虚拟现实新闻：理念透析与现实批判 .....	(246)
关系赋权：社会资本配置的新范式 ——网络重构社会连接之下的社会治理逻辑变革 .....	(249)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	(251)
互联网使用、在线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 .....	(256)
新媒体如何影响群体性事件？ ——中介机制与实证检验 .....	(260)
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 .....	(264)
网络迷群的社会动员与情感政治 .....	(267)

被忽视的冲突：反思网络迷群中身份认同及其建构 .....	(271)
网络公共领域的道德绑架与交往理性	
——以范玮琪阅兵晒娃事件为例 .....	(275)
再现的网民：多元的形象与单一的角色	
——基于《朝闻天下》《新闻1+1》中的网民形象考察 .....	(279)
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	(283)
新生代农民工QQ使用与社会资本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	(289)
科学工作者变身自媒体人：话语、角色及影响 .....	(294)
复杂的用户：社交媒体用户参与广告行为研究 .....	(298)

## 论文题录

理论与范式 .....	(305)
新闻史论 .....	(306)
伦理与规制 .....	(307)
媒介研究 .....	(308)
传播研究 .....	(308)
新媒体研究 .....	(310)

全文转载



# 唐代的政治传播体系 建设与国家整合

陈雅莉 张 昆

**摘要：**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传播学的视角，集中探讨了唐代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家整合所进行的政治传播体系建设活动。研究表明，在国家传播机制的设置上：一方面，唐代“三省一台”在政治信息传播方面协同合作，形成了唐代帝王与群僚百司、京府诸司与地方州府进行政治信息联通的有效传播网；“投匭”制度的设置，为基层信息由下至上传递提供了新的灵活渠道。在统治者的政治传播实践上，唐初统治者积极致力于“求谏”和“纳谏”以促进帝王与官僚集团的信息互动；同时又多次颁布《诚表疏不实诏》等诏令以革新官文书文风，促进上下沟通。另一方面，为了整合王畿和地方社会，唐代积极建设以“官驿”为核心的官书传递系统，并通过“朝集使”等制度维护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权威。这些举措为促进“王畿—地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有利于国家主导性规范在地方社会的推广，既是唐代中国促成制度和结构层面“大一统”的基础性条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大一统”中国的建构开拓了新的想象空间。

**关键词：**唐代 政治传播 三省一台 投匭 官驿 朝集使

前大众传播时代，帝国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管理成为早期政治传播活动的雏形，传播技术的相对落后，使得以官书、驿马为主导性媒介和渠道的政治传播活动成为了古代君主国家强化认同的有效手段之一。唐代是中国在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离乱之后重新统一和复兴的时期，即是西方东亚史学家所称的“中华第二帝国”的核心阶段。不论是在中国历史

的时间纵轴上，还是在中古世界的空间水平坐标上，此时的中国在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文教水平上都崛起到一个新高度。这种物质上的统一和复兴，首先应该来自唐初中央致力于帝国政治传播体系建设所带来的行政集团内部关系的和谐和行政效率的提升。

## 一 中央传播体系建设与行政体系内部的关系整合

统治集团内部有效的信息互动，有利于提高行政体系的运行效率，亦能促进组织文化的共享和维持，对统治集团内的关系整合和凝聚力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集团“并不是界限导向和水平式的，而是向心而阶层式的”。<sup>①</sup> 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其社会结构也具有类似向心层级式特征；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社会向心结构以稳固的内核，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来源。

### 1. 革新官书文风，促进上下沟通

隋由盛转衰，继之以李唐立国，前后不过数十年。杨隋在政治传播上的疏失必给李唐帝君以警示，故李唐在立国之初，高祖“思革前弊，念兹在兹。……军书羽檄，日有百数。一言一事，靡不览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sup>②</sup>

首先，唐初官吏上疏陈文之风气，多有沿袭隋末文书虚妄不实、谄媚赘言的弊端，故唐高祖武德元年发布了《诫表疏不实诏》，曰：“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贼盗，不肯直陈。言论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矫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表奏如是，稽疑处断，不知此者，谓我何哉。宜颁远近，知朕至意。”<sup>③</sup> 观此诏令，其明确地传播了唐中央在政治传播上的主导性理念，即为了保证政治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提高中央机构的行政效率，官方文书务求：（1）针对民情国事、明确观点；（2）篇幅精简，切莫“乱语细书，动盈数纸”；（3）不可虚语逢迎，忌“妄引哲王，深相佞媚，狡托福瑞”。

其次，唐初官僚集团内部的组织关系亦受到隋炀帝一朝遗弊的影响，

<sup>①</sup>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9页。

<sup>③</sup> 同上。

官僚体系人情浮薄。如唐武德元年所颁之《令内外官人相存问诏》所言：“自隋氏驭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之心，下无和畅之志。遂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至乃里闾相接，致胡越之乖。艰棘在身，忘救恤之义。”针对此弊端，唐高祖始有革新组织风气、促进团结和睦之意，故颁《令内外官人相存问诏》诫谕百官：“凡厥庶僚，咸使辑睦。君臣之际，期于无隐。……自今已后，内外官人，须相存问，勿致疑阻。有遇疾疹，遽加诉候。营救医疗，知其增损。……斯则上下交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达于四方。布告天下，咸知朕意。”<sup>①</sup>按此诏令，唐高祖诏认为，统治集团内部应该以存问、交游、慰省等日常活动消除猜忌、增进情谊、提升信任；惟有基于这种良性的组织关系，唐帝国的核心权力集团才能实现“品物咸亨，惠政所加，达于四方”的政治目标。

唐高祖所提出的官书谏言应直陈实录、篇幅精简，君臣群僚应上下交泰、辑睦无隐等政治传播观念，上革隋朝言路遗弊，下启太宗纳谏之风。从政治传播思想的导向作用看，实起到了承前启后之作用。观之于唐太宗时期，上下言路大开，其君臣间良性的沟通互动和关系结构，则不可不归功于高祖致力于政治传播改革的铺陈作用。

## 2. “求谏”和“纳谏”：唐初帝王与官僚集团的信息互动

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议唐太宗曰：“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然其能承隋末乱亡而致贞观之治，其过人之处，实在于其能够在统治集团形成一个宰相参与平章国计、谏臣从旁颉议执论、君王导人使谏的良性互动的政治意见场。<sup>②</sup>

贞观初年，太宗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sup>③</sup>《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朝容庄重威仪，百官常为之慌张拘束而不敢直言应上；太宗得知后，则总是和颜悦色以导人从谏。<sup>④</sup>受到前朝为政疏失的影响，唐太宗对于政治信息的沟通非常重视，“求谏”成为了唐太宗为政时期的重要执政方略。

①（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9页。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③（唐）吴兢：《贞观政要》，骈宇騫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5页。

④ 同上。

所谓“求谏”，其一在于“兼听”，即主张扩展信源渠道：一方面，太宗非常重视谏官的作用。贞观元年，谏议大夫王珪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谏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sup>①</sup>太宗以为甚是，即诏令自是谏官必须同随宰相入禁内参与平章国事。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了弥补自身见识之有限性，非常重视与不同官员之间的对话沟通。贞观初年，太宗“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物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sup>②</sup>其二在于导人“谏诤”，即鼓励官员执言执论，批判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争者，启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有妄有畏惧，知而寝默。”<sup>③</sup>

“求谏”，首先，必须建立在传授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对于君臣关系的维系和增进，唐太宗深谙君臣之间先义后利的道理。贞观五年，太宗曰：“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又贞观六年，太宗曰：“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sup>④</sup>与太宗以“君臣保全”来建构君臣之义，即是在观念上将君臣关系由“我一他”关系重构为“我群”共同体。其次，“求谏”还必须以“纳谏”作为保证。君王纳谏，于群臣的进谏行为而言，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反馈模式，有利于刺激统治集团内部信息流的良性循环。太宗多以义、利兼施的方式回馈谏言者：所谓“义”的方面，即帝王对臣下的谏言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对谏言者予以礼谢和表彰；所谓“利”的方面，则是帝王用恩赏物质利益的手段回报谏言者。如贞观三年，太宗下书李大亮曰：“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又贞观十七年，陈疏朝政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表彰高季辅，言“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sup>⑤</sup>

①（唐）吴兢：《贞观政要》，骈宇騫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31页。

④ 同上书，第34、37页。

⑤ 同上书，第123、128页。

贞元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中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能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sup>①</sup>以此观之，虽然唐太宗积极求谏，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唐中央亦存在言路不畅之处。究其原因，则在于魏徵所言之传播者个体的差异性。至于唐太宗后期，则言路阻止更甚：“谏鼓空悬，逆耳之言罕进。谤木徒设，悖心之论无闻。”<sup>②</sup>故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太宗复颁《令群臣直言诏》以通言路。

### 3. 唐中央以“三省一台”为架构的政治传播体系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观察，中书省，是为帝王向下发布政令信息的编码和发出机构；门下省，是为下层信息上递至帝王的接收和解码机构；尚书省，是为中央各司与地方州府进行政治信息交换的中转遣发机构。御史台本质上是唐中央基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政治纠察机构；御史台所行之监司、督事、巡按之职责，比之于门下省、中书省作为国家政令出纳之喉舌机关，尚书省作为国家政令施行之股肱部门，其角色则更近，似乎是国家行政系统有序运行的信息监控器和稳定调适仪。

中书省，由中书令掌领，“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从传播学看，中书省是帝王政令的编码和发出部门。一方面，作为帝王诏敕的编码机构，中书舍人掌领此职，“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其中，“一人知制诰，颺进画，给食于政事堂，其余分属制敕”。<sup>③</sup>后因中书事务繁复，亦因帝王重用学士，翰林院遂逐渐演化成为掌管制诏书敕之所；另一方面，作为王命向下传播的中转机构，中书省的职责在于对帝王向下传递的政治信息进行审核勘对：帝王下达之政令，按其内容和重要程度可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以及敕牒七种，<sup>④</sup>中书令“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sup>⑤</sup>《唐会要》载，武德三年，高

①（唐）吴兢：《贞观政要》，骈宇騫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6页。

②（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6页。

③（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1页。

④ 册书，即为立后、封王、临宣策命时使用；制书，即为大行赏罚、授大官爵、赦免降恩使用；慰劳制书，即在褒奖和勉励贤良之士、勤劳之人时使用；发敕，即在州县废置、官员增减、发兵、除官、授六品以下官爵、发流放以下罪，以及使用一定程度的库务钱粮时则用之；敕旨，即为百司奏请被采用施行时使用；论事敕书，则用于诫约、慰谕臣下；敕牒，则用于不易典制、随事承制〔（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25—926页〕。

⑤（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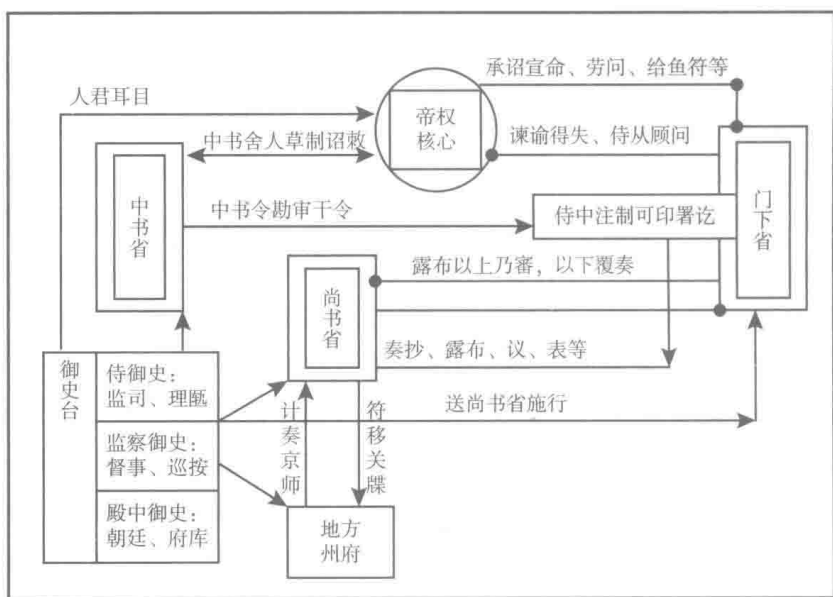


图1 以三省一台为架构的唐中央政治传播网络

祖因所发敕令中书省未按时宣行而责问其缘由，内史令萧瑜对曰：“比每授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又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刘祎之窃与人言反对则天临朝称制，肃州刺史“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是时中书省名凤阁）”。<sup>①</sup>可见，中书省作为帝王书敕向下传播的中介机构，其所行使的“宣署申覆”职能对于保证王命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门下省，以待中为最高长官，“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专判省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首先，门下省作为“下之通上”的信息接收和解码机构，其职能在于对下级上递文书进行审核和校正：下级百司上呈之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凡六种制式的文书，“自露布以上乃审；其余覆奏，画制可而授尚书省”；侍中所审核之文书（露布以上），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将进行详细复核：“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矫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矫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其次，

①（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25—927页。

作为帝王政命的对外传播机构，门下侍中承担着帝王下达政命的前导性和仪式性的宣布职能：“四夷朝见，则承诏劳问。临轩命使册皇后、皇太子，则承诏降宣命。……发驿遣使，则给鱼符。”最后，门下省之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其职责在于“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则“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由此观之，门下省的政治传播职能还在于通过讽谏、顾问等形式与帝王进行信息沟通，进而对帝王决策产生影响。<sup>①</sup>

尚书省，亦唐沿隋制所设，为中央政令的执行机关。下属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故国家之官吏、户籍、祭祀等诸般事宜皆属其所司隶，所谓“庶务皆会决焉”是也。尚书省由尚书令（正二品）统领百官，然由于唐太宗曾为尚书令，百官皆不敢当领此职，故由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尚书省所涉之政治信息传播的书面载体，凡上情下达，皇帝所用的有“制”“敕”“册”，皇太子所用之为“令”，亲王、公主之所用称为“教”，上一级行政层级向下一级传播政治信息的文书制式曰“符”，如省下文于州，州下书于县等；凡地方下情上传至中央的政治文书，则有六种制式，即为“表”“状”“笺”“启”“辞”“牒”；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则文书制式有三，即为“关”“刺”“移”。<sup>②</sup>按《唐会要·尚书省》记载：“京府诸司，有符移关牒下诸州府，必由都省以遣之。”<sup>③</sup>《新唐书·百官志》又言：“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凡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能决者，皆上尚书省。凡制敕计奏之数、省府宣告之节，以岁终为断。”<sup>④</sup>从政治传播的功能看，尚书省既是京府诸司向地方州府下达各类政治文书、“诸司相质”文书往来的中介遣发机构，亦负责统计中央政令下达和地方计奏上传的年终数目——实为国家中央与地方政令信息往来的“喉舌”机关，诚如唐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所云：“周有六卿，分掌国柄，各率其属，以宣王化。今之尚书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称会府。实曰政源。庶务所归，比于喉舌。”<sup>⑤</sup>

①（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5—1207页。

② 同上书，第1184—1185页。

③（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84页。

④（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85页。

⑤（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86页。

唐帝国中央的耳目之司，是为御史台。就促进中央政治系统的整合而言，御史台的职能在于对京府诸司的运转进行监测和纠举。御史台之台院，由侍御史掌理，主要负责“纠举百僚及入阁承诏，知推、弹、杂事”。唐朝将京畿诸司和诸州分为东、西，侍御史中由一人“知西推、脏贖、三司受事，号副端”；另有一人负责知东推、理“匭”等（所谓“推”，即推按的意思）。<sup>①</sup> 侍御史通过推按诸司行政和理“匭”，为权力核心持续性地收集和上报来自于权力结构次中心和外圈层的运行信息，若发现百官有失范的情况则纠举之。御史台之察院由监察御史掌理，“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sup>②</sup> 对比侍御史的监司之责，一方面，监察御史的工作在于“督事”，即监督按察各部门断事的规范性：不论是战事告捷后对战利品信息的统计，还是对财政上的屯田、铸币等事宜的开展，亦或是官司的审决，都须由监察御史参与和推按，并将相关信息上报君王。另一方面，监察御史的工作还在于“巡按”，即巡行按察州县。如“十道巡按”，其内容包括“察官人善恶”“察户口流散”“察农桑不勤”“察妖滑贼盗”“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sup>③</sup> 作为“耳目”要司，御史台触角的多向延伸，体现了唐代国家政权核心对国家次中心、地方权力机构以及基层社会秩序进行控制和维持的渴望：一方面，通过持续性收集、纠举京师诸府的日常行政信息以纠正中央行政体系中的运行失范；另一方面，则通过不定期地收集地方政情风俗，促进主导性规范在基层社会的推广与维持，进而得以宣慰地方、疏导基层矛盾，维持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权威性。

#### 4. “投匭”：唐中央促进下情上达的侧面进状制度

所谓“投匭”，即唐中央为了防止下情上达之漏塞而设置的侧面进状制度。垂拱二年武后始议设“匭”。是时，鱼宝宗上书请置四色铜匭于朝堂四方以接收各方上书，东方列青匭，谓“延恩”，“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置丹匭，谓“招谏”，“论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放白匭，谓“申怨”，“陈抑屈者投之”；北方设黑匭，谓“通玄”，“告天文、祕

①（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7页。

② 同上书，第1239页。

③ 同上书，第1240页。

谋者投之”（《唐会要》载北方置元匭，有能告以智谋者投之）；后四匭合而为一。<sup>①</sup> 知匭使和理匭使主责“匭事”：每日所有投书由知匭使负责日暮进呈。<sup>②</sup> 知匭使，始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任”，宝应元年改为由中书门下择清廉官员一人充任，建中二年又改为由谏议大夫一人担任；理匭使，始“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任”，宝应元年改为由给事中、中书舍人担任，建中二年又改为由御史中丞出任。<sup>③</sup>

开元三年，太玄宗颁《听百寮进状及廷争敕》曰：“恐人有不或未安，政有不便，乃令外司置匭，听侧面进状，封章论事，靡所不达。”<sup>④</sup> 《唐会要·匭》载，“大历十四年，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职、婚田两兢、追理财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后省司。省司不理，然后三司。三司不理然后合报投匭进状。’”<sup>⑤</sup> 又唐开成五年四月敕曰：“匭函所设，贵达下情。……实付冤屈有司不为申明者，任投匭进状。所由画时引进，其余并不在投匭之限。”<sup>⑥</sup> 由此观之，投匭制度所辖之诉状范围囊括了关于基层社会的所积滞之各类矛盾及冤枉之信息，所谓“靡所不达”“任投匭进状”是也。

唐旧例，投匭之进状及书策文章皆备副本，应先呈匭使检验副本，以取舍是否能被递进。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敕曰：“理匭使担任投匭人投奏表于匭中，依进来，不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便止遏。”又开成三年八月，谏议大夫知匭使李中敏奏曰：“臣以为本置匭函，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通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于九重之意也，臣伏请自今以后，所有进状及封章，臣等但为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sup>⑦</sup> 唐中央两度废除匭使验副本的决定，表明了唐中央对投匭制度所寄予的畅通下情上达渠道的政治意图。

①（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6—1207页。

②（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56页。

③（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6—1207页。

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6页。

⑤（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57页。

⑥（清）董浩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⑦（宋）王傅：《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57，958页。